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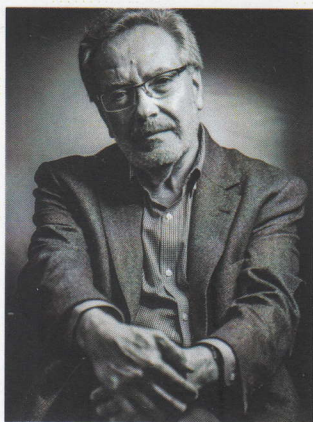
西班牙与东亚
早期交流史

XIBANYAYUDONGYA
ZAOQIJIAOLIUSHI

Antonio Bueno García
Yan Li
Nadchaphon Srisongkram
Enrique Cámara Arenas
David Pérez Blázquez /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 Antonio Bueno García, 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大学翻译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第二作者: 闫立, 西班牙巴里亚多利德大学博士, 暨南大学翻译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及翻译史。

第三作者: Nadchaphon Srisongkram, 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大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第四作者: Enrique Cámara Arenas, 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大学哲学及文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

第五作者: David Pérez Blázquez, 西班牙阿里坎特大学翻译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摄像师: Eugenio Gutiérrez. 来自 El Día de Soria 日报)

LOS PRIMEROS CONTACTOS ENTRE
ESPAÑA Y ASIA ORIENTAL



Antonio Bueno García

摄像师: *Eugenio Gutiérrez.*

来自: *El Día de Soria* 日报

Antonio Bueno García

YanLi

Nadchaphon Srisongkram

David Pérez Blázquez

Enrique Cámara Arenas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西班牙与东亚的早期交流史 / (西) 安东尼奥·布艾
诺·加西亚, 闫立, (西) 那茶彭·斯里宋康著. —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9.7
ISBN 978-7-5670-2296-6

I. ①西… II. ①安… ②闫… ③那… III. ①西班牙
语—翻译—研究 IV. ①H34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5430 号

西班牙与东亚的早期交流史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版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pbu.ouc.edu.cn>
电子邮箱 whs0532@126.com
责任编辑 邓志科 施薇 电 话 0532-85902533
印 制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0.25
字 数 373 千
印 数 1-1000
定 价 32.00 元
订购电话 0532-8590257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18600843040, 由印刷厂负责调换。

PRÓLOGO

*La misión como escenario de entendimiento entre
dos culturas y civilizaciones avanzadas*

LOS PRIMEROS CONTACTOS ENTRE ESPAÑA Y ASIA ORIENTAL

Antonio Bueno García (Ed.)

AUTORES:

Antonio Bueno Garcí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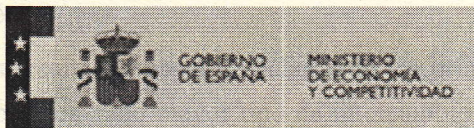
Enrique Cámara Arenas

David Pérez Blázquez

Yan Li

Nadchaphon Srisongkram

Publicación efectuada en el marco del Proyect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ón, financiado por el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Industria y Competitividad (Gobierno de España), Ref.: FFI2014-59140-P «Catalogación y estudio de las traducciones de los dominicos españoles e iberoamericanos».



十六至十七世纪东亚地区道明会传教过程中的翻译与传福音活动

安东尼奥·布埃诺·加西亚

巴利亚多利德大学（西班牙）

antonio.bueno@uva.es

翻译：庞博、林杏贞、陈超慧

摘要：继进入美洲之后，西班牙道明会多次尝试进入东亚并在该地区落地生根，但均以失败告终。而后，西班牙道明会得以从菲律宾进入包括中国、日本、越南、台湾以及越南在内的东亚地区（1565年），通过开展语言学习和翻译活动在以上国家及地区进行福音传教。本文从文本角度（包括已出版及未出版的文本）对西班牙道明会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进行概述。

关键词：翻译 传福音 传教 道明会 东亚

Abstract

After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several failed attempts to achieve a permanent settlement in East Asia, the Spanish Dominicans managed to enter from the Philippines (1565) in East Asia: China, Japan, Vietnam, Taiwan and Korea and evangelize these territories with the invaluable help of learning language and the use of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most important mileston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texts saw the light and others who remained unpublished.

Keywords: Translation. Evangelism. Dominican. Mission. East Asia.

1. 最初的传教活动

如果某些作家的作品是可信的话，我们会发现，早在十三世纪三十年代（1227-1233），道明会的伟大使徒圣哈辛托（San Jacinto de Polonia）^①已经到过中国。从教派起源来看，许多传教士从东欧出发，到达波斯和印度，并由此前往中国。据神父乌雷塔（Urreta）^②的记载，如1390年，很多传教士从位于埃塞俄比亚的普利曼诺斯^③和哈利路亚修道院出发，前往印度、暹罗、勃固^④和中国开展传教活动。传教热潮一直持续到十四世纪。当时，由于穆斯林对基督教徒的迫害、鞑靼人的攻击、黑死病的肆虐以及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从西方通往东方的道路被切断了。

面对出现在眼前的中国，道明会传教士详细地加以描述^⑤，将其形容为一个有着自己思想且不允许外来宗教干扰的封闭大国。四千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宗教机构得到高度发展，其国民认同及国家身份一直没有被破坏（尽管曾被外来王朝统治）。它的历史和西方的截然不同。在这片土地上，从未经历过如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那般血腥的革命。

① 引自：Barón de Henrion, 1863.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Misiones*, t. I, p. 31, edición de Barcelona; P. André Marie, O.P.: *Missions Dominicaines dans l' Extrême Orient*, t. I, p. 5-7

② Luis Urreta, O.P., 1611. *Historia de la Sagrad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los remotos reinos de Etiopia*. Valencia

③ 音译，原文为 Plurimanos——译者注

④ 勃固省，缅甸的一个省，位于该国中南部平原，首府勃固，下分四县——译者注

⑤ 在十七世纪由多本著作记载。如：Aduarte, Diego, 1640: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c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Philippinas, Iapon y China...* Manila: en el Colegio de Sa[n]cto Thomas, por Luis Beltran impresor; Arnaud, 1692: *Historia de los debates entre los Misionero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de Santo Domingo, i San Francisco, sobre los Ritos de la China*; Urreta, Luis, O.P., 1611: *Historia de la sagrada Orden de los predicadores en los remotos reynos de la Etiopia*. 该文本讲述了伟大的圣徒、殉道者、忏悔神父及宗教法庭法官的故事，以及有九千名哈利路亚修士、七千名 Bedenagli 修士、五千名修女的清教徒修道院和来自瓦伦西亚的圣道明神父在宗教方面所取得的丰功伟绩；

万济国，《圣经明征》（Varo, Francisco. 1671: *Declaración y manifiesto [sic] de la verdad de algunas cosas que dice el reverendo padre Diego de Fabro en un tratado que hizo en prueba de la practica que los padres de la compañía tienen en este reyno de China acerca de la veneración de Confucio, y difunctos, Canton, 13 de septiembre 1671. Manuscrito de Manila, APD, T73*）。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传教士们传福音的伟大时代恰是大航海时代^①。1486年，葡萄牙人发现从非洲通往东方的新道路；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e Gama）绕过好望角。此后，许多传教士就远涉重洋，经过数个国家，奔赴中国和日本。

1503年，五名道明会修士经阿尔武尔克尔克^②镇离开葡萄牙，穿越印度洋，到达了科钦^③以及其他地区，相继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教区、教堂、修道院、医院等。1504年，他们到达勃固。来自葡萄牙的道明会修士加斯帕尔·德拉·克鲁斯（Gaspar de la Cruz）与其他同伴一道在柬埔寨建立印度支那的传教区，并于1556年尝试进入中国。他们在广州和澳门传教。然而，他们在中国的停留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1.1 相遇在契丹^④

传教使命可以以自愿的形式或通过教会颁布教令来执行。对于前者，僧侣修士必须向上级表达他们的志向以及远赴重洋的意愿。确实，很多人是受到上级劝使的，还有其他一部分人是想要前往新土地上碰碰运气，但基本上，他们似乎都是准备要彻底改变生活，实现其新的人生计划。

已经在美洲停留多时的西班牙道明会修士们沿着另一条路线离开了墨西哥。他们穿越太平洋，于1581年抵达菲律宾，而后在1587年抵达澳门。就这样，他们与沿葡萄牙路线而行的教会弟兄们在契丹相遇了。

西班牙设立了道明会的各个省份提出与大主教和皇室达成传教行动协议。西班牙省教区负责组织到新大陆的远征。第一批传教士于1510年从萨拉曼卡修道院出发，他们到达了伊斯帕尼奥拉岛^⑤，并从那里途经古巴（1512）先后

① 这一时代也适逢十五世纪托钵修会经历的精神革命。在那个人心惶惶多灾多难的年代，僧侣修士和神职人员面临着生存危机，也几乎破坏了他们的修道生活。这引起了他们大部分人在态度上的根本性变化。他们宣称需要改变修道传统，才可以继续根据福音的指示生存，并到各个角落布道，他们也因此被赋予了修道改革者之名。（托钵修会，西班牙语为Orden Mendicante，是一种以他人慈善布施为生的天主教宗教修会。十三世纪以前，西方教会的修道生活主要依从本笃会的隐修传统，后来才兴起了有别于隐修传统的托钵修会，这给修道生活带来深刻的改变，除了注重会士个人修养外，也视宣道或使徒工作为修会神恩的基本要素——译者注）

② 阿尔武尔克尔克（Alburquerque）是西班牙的一个城市，属于巴达霍斯省（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译者注

③ 印度喀拉拉邦最大的城市和主要港口——译者注

④ 契丹（Cathay），中世纪欧洲国家对中国的雅称——译者注

⑤ 伊斯帕尼奥拉岛（Española），又名海地岛或译西班牙岛，是加勒比海中第二大岛，分属海地和多米尼加两国。该岛位于古巴东南部，波多黎各的西部——译者注

到达了玛格丽塔和委内瑞拉（1516）、巴拿马（1519）、秘鲁（1524）、墨西哥（1526）、中美洲和新格拉纳达（1529）、厄瓜多尔（1534）、智利（1540）、佛罗里达（1542）以及阿根廷（1550）。

1.1.1 从美洲到亚洲

费利佩二世希望找到一条从美洲出发到达东方的快速而安全的路线。这一愿望几经挫败落空后，最终得以成为现实。借由那场由墨西哥的总督米格尔·洛佩兹·德·莱格兹皮（Miguel López de Legazpi）指挥、由奥古斯丁人安德烈斯·德·乌尔达内塔（Andrés de Urdaneta）建议提出的远征，西班牙最终得以在1564年11月找到从墨西哥通往菲律宾的道路。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上进行军事和宗教征服，同时也意味传教活动的帷幕正式在在菲律宾群岛拉开，并逐步延伸到亚洲。

1.1.2 玫瑰圣母省教区的创建

传教士们都是从西班牙、意大利或葡萄牙最好的修道院中选出来。他们大多拥有学士学位，并且已经在西班牙和菲律宾的有过学习及授课经验。在马尼拉，这些传教士们在被派到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前，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严格的习训，在汉学专家修士的指导下完成对中国语言、风俗、文学和宗教的研究学习，并且与在教会和他们所建的巴里安医院中的中国人熟络。

道明会修士道明哥·德萨拉萨尔（Domingo de Salazar）^①是马尼拉第一大主教。在他的组织带领下，由四十名修士组成的传教士团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前往菲律宾，并创建了玫瑰圣母省教区。横渡太平洋的旅途困难重重，几名修士在旅途中相继去世。因此，只有十五名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修士于1587年的7月21日顺利登陆甲米地^②，另外还有三名抵达澳门。踏上菲律宾国土的十五修士中，有四名继续留在马尼拉：贝纳维兹神父（Benavides）、索里亚（Soria）、胡安·马尔多纳多（Juan Maldonado）和教友弟兄佩德罗·罗德里格斯（Pedro Rodríguez），他们就在这里建立了圣道明哥修道院。1588年，在新一批传教士团抵达后，首次举行了教士团会议，在会议上重新定义了在远东的传教性质：希望借助菲律宾这一跳板，最终到达中国、日本及其他地区。1952年，在威尼斯举行的教士团总会议中通过创建玫瑰圣母省教区的决

① 来自萨拉曼卡修道院的一名修士，是十六世纪两位伟大的知识分子——道明哥·巴涅斯（Domingo Báñez）和巴托洛梅·梅迪纳（Bartolomé Medina）——的同学。

② 甲米地（Cavite），菲律宾吕宋甲拉巴松（Calabarzon）政区的一个省份，位于马尼拉湾南岸——译者注

定。值得思考的是，阿杜阿尔特（Aduarte）在其著作《道明会在菲律宾圣罗萨里奥省教区、日本及中国的历史》中所援引的理由：

对于严肃神圣的神父们来说，在这新地区的宗教（菲律宾）中没有我们所信仰的宗教，这并不是什么得体的事情。教会在墨西哥建立教区的省份富裕无比。他们听到了关于菲律宾的宏图伟略和迫切需求，他们互相交流，所有人一致认为应该试着到达这个地区。（Aduarte, 1640 : 10）

菲律宾最著名的传教士（后予以详述）包括：迪亚哥·德·圣玛丽亚（Diego de Santa María）、弗朗西斯科·布兰卡斯·德·圣何塞（Francisco Blancas de San José）、胡安·加西亚（Juan García）、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Antonio Fernández）、安德烈斯·洛佩兹（Andrés López）、安布罗西奥·马丁内斯（Ambrosio Martínez）、道明哥·涅瓦（Domingo Nieva）、胡安·奥马萨（Juan Ormaza）、哈辛托·帕尔多（Jacinto Pardo）、米格尔·鲁伊斯（Miguel Ruiz）、马科斯·萨维德拉（Marcos Saavedra）及加斯帕尔·萨尔法特（Gaspar Zarfate）。

1.1.3 于亚洲的扩张——从菲律宾到远东

从菲律宾远道而来的传教士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日本。传教活动在1602^①年就已经在日本出现，然而三十年以来波折变故不断^②，殉道者众多。直到1637年，基督教团体有组织地撤离。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里，他们再也无法在日本传教。在日本，著名的传教士有：迪亚哥·柯略多（Diego Collado）、哈辛托·奥尔法内（Jacinto Orfanell）、道明哥·伊瓦涅斯·德·艾尔基西亚（Domingo Ibáñez de Erquicia）以及托马斯·德·苏马拉加伊拉兹卡诺（Tomás de Zumárraga y Lazcano）。

传教士们下一个目的地是位于菲律宾与日本之间的台湾。1626年，西班牙传教士们抵达当时被称为福尔摩沙的台湾。他们在那里继续开展传教活动，直到1642年8月，荷兰军队的攻打入侵迫使他们退回到马尼拉。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西班牙道明会修士曾多次试图于该地区恢复传教活动，但直到1859年，他们才得以如愿。

① 十年前，即1592年，菲律宾总督就已经派遣了高母美到这些地方并发表了外交宣言。

② 1614年，达夫大人发布政令，下令所有传教士离开日本，破坏他们建立的所有教会，收缴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之物，要求他们放弃信仰，并供奉日本神像。七位神父得以避开天皇的监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宗教迫害逐步加剧，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或进入监狱，或流亡，或死亡。道明会殉教者达22人。

历经七次失败的尝试之后，玫瑰圣母省教区于1631年得以如愿，最终从福尔摩沙^①进入中国。从福尔摩沙进入中国的过程并没有什么戏剧化的事件，修士们因此得以在福建地区进行长达三百年的福音传播活动。神父科钦（Cochi）和塞拉（Serra）是最先到达福建的。他们修建了一座小教堂，并开始使几个出身显赫家庭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科钦神父去世后，熟知中国文化和宗教仪式的胡安·包蒂斯塔·德·莫拉莱斯（Juan Bautista de Morales）神父取代了其职位。由于一次毁坏中国神像的皈依事件，政府颁布驱逐令，但修士们在一段时间后得以重返该地区。随着鞑靼人的入侵，1644年建立了清朝，传教士们遭到多次攻击（1648年1月15日，弗朗西斯科·德·卡皮利亚斯（Francisco de Capillas）逝世，成为第一个殉道者），但是传教人员依然不断从马尼拉前来以补充空职。

在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传教士有：米格尔·贝纳维德斯（Miguel Benavides）、高母羨（Juan Cobo）、阿尔贝托·科亚雷斯（Alberto Collares）、弗朗西斯科·迪亚兹（Francisco Díaz）、胡安·加西亚·卡朋特罗（Juan García Carpintero）、道明哥·德·涅瓦（Domingo de Nieva）、雷蒙杜·德尔·瓦莱（Raimundo del Valle）以及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55年，为了巩固已有的传教活动并在厦门开启新活动，无数教徒离开了马尼拉。在往后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免受宗教迫害的威胁。

下一片传教目标领域是位于中国南部的北部湾（越南）、柬埔寨和老挝。1672年，由于马尼拉总督不愿与葡萄牙人起冲突，道明会隐秘地派出神父胡安·德·圣克鲁斯（Juan de Santa Cruz）和神父胡安·德·阿尔霍纳（Juan de Arjona）担任由罗马教会新任命的—个省教区的神职职位。继他们之后的是神父迪奥尼西奥·莫拉莱斯（Dionisio Morales）。但其中两人经历了监禁和驱逐，只有圣克鲁斯神父可以留任。后来传教士的增援陆续抵达，并在往后三十年间持续稳定地进行传教活动。

1.2 宗教矛盾与社会矛盾

最初对传教士盛情款待的日本天皇开始公然对传教士表示不满，因为他们当时的布道使人民逐渐接受了基督教的教化。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宗教态度上的转变很大程度归咎于当地的英国和荷兰商人（同上，第44-45页）。

① 福尔摩沙（Formosa），欧洲早期对台湾岛的别称。根据台湾学者研究，在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初登台湾岛发出的惊叹之语“*Ilha Formosa!*”而得名，意为美丽岛。此后“福尔摩沙”这一直作为台湾国际名称，1950年代国民政府迁台后，作为中文罗马拼音的Taiwan使用愈趋普遍——译者注

在中国，1615年，即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袁立^①在任期间，发生了南京教案。案件陈述的是传教士使民众和知识分子离弃了先祖的宗教文化，并不断传授一种与中国伟大师者思想相违的哲学。而且，他还指控基督教是不道德的，因为男女在教堂内共处一室（González，1964：第20页）。

1617年，法令将这些“狡猾的蛮族”——传教士团——流放至澳门。

传教士们无比顽强，他们甚至在监狱中还继续传教。和其他宗教的传教士一样，道明会的修士们不仅对看守的狱卒讲解教义，还暗地里往菲律宾和西班牙进行书信往来，而大部分书信也存留至今。档案中有各式各样的亲笔手稿，包括拘押在狱期间的文稿，成为记载传教活动史实极具价值的材料来源。

于远东地区殉道者的名单上人员众多。同时代（十六至十七世纪）的道明会传教士包括在日本的阿隆索·纳瓦雷特（Alonso Navarrete）、阿隆索·德·梅纳（Alonso de Mena）、安赫尔·奥尔苏奇（Ángel Orsucci）、道明哥·卡斯特雷（Domingo Castellet）、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Francisco Morales）、哈辛托·奥尔法内（Jacinto Orfanell）、何塞·德·圣哈辛托（José de San Jacinto）、胡安·德·圣道明哥（Juan de Santo Domingo）、路易斯·贝尔特兰（Luis Beltrán）、路易斯·弗洛雷斯（Luis Flores）、佩德罗·巴斯克斯（Pedro Vázquez）、托马斯·德尔埃斯皮里图·圣祖马拉加（Tomás del Espíritu Santo Zumárraga）和道明哥·伊瓦涅斯·厄基西亚（Domingo Ibáñez Erquicia），以及在中国的第一个殉道者——弗朗西斯科·卡皮拉斯（Francisco Capillas）。

如果留意他们的证词材料，会发现这些沧桑沉浮似乎并没有对传教士产生影响。以下是日本殉道者——今被溢名的圣徒道明哥·伊瓦涅斯·厄基西亚（Domingo Ibáñez Erquicia）——写给马尼拉省教区主教的信件。

我们在这里传教的方式是这样的：夜幕正降临之时，我们离开白天所处的房子前往下一个地点，因为我们不会在任何一处停留超过一个晚上。之后给找我们的病人听忏悔。然后，在路途中，我们基督教徒都会汇聚一起。我们在那里做忏悔告解直至街上的店铺即将打烊关门，大概晚上十点的样子。在那个时间，我们会启程回到当天过夜的房子，我们还会在那里度过第二天白天。在那里我们听人们忏悔，他们会在第二天领取圣餐，听忏悔一般会到十二点有时甚至会更晚才结束。有些时候由于太晚，我们会在就寝之前对他们做弥撒并受圣餐。如果时间尚早，我们就会在天亮前起床做这些事。之后，在白天，我们听房主及其一些熟人忏悔，但他们不敢让太多

^① 音译自 Yuang-Li，应为沈樵，此处可能为作者笔误——译者注

人进入家里，因为当时对传教士正实施严密追捕。[.....]

我可以确切地说，此生我不曾在任何其他地方有过像在这里一样的愉快和满足，因为我看到了基督教徒们的虔诚，也看到了我们的传教工作在他们身上所散发的熠熠光芒^①。

1.3. 道明会与政治力量及其他教派的关系

虽然当时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曾经平稳良好，没有冲突，但在十七世纪，由于当地部分国家官员滥用和褻渎职权，教徒和皇室上层经历过一段紧张对峙的时期。就皇室官员代表而言，他们一直认为修士们没有服从教旨的命令。帕斯特利斯（Pastells）提到在菲律宾群岛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刻：

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由于菲律宾国王的最高官员代表——省长、总司令和督察——阻止教会法庭对印度人采取保卫行动，教会当局把他们驱逐出教会。此后，教会与菲律宾当地政府的对抗斗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帕斯特利斯，1936：第八章，p. 41）^②

十六到十七世纪间，政权和教会权力之争无疑也同样出现在远东地区。道明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会士在伊比利亚半岛逐渐发生的冲突对立是在双方教派理性主义下主导的，可以理解为这是出于双方教派在启蒙主义（主张只有通过祈祷才能臻于完美，而无需遵从虔诚的仪式惯例）和寂静主义^③上相似的立场；而道明会修士和耶稣会会士在人类自由意志对圣宠神恩^④的作用上进行了论战。考虑到以上这些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论争，上述教派之间在亚洲地区的紧张状态也是十分重要的。

道明会不得和方济各会及耶稣会共同开展传教活动。虽然这个关系是由于各教派所面临的潜藏危险才得以缔结，而且该关系并不十分紧密，但道明会至少和耶稣会建立了联系以开展合作。

① 引自：en Villarroel, Chus, 2012, p.8

② 费尔南德斯·罗德里格斯，2012年（R Fernández Rodríguez - 2012）

③ 精神论战即贫穷教会或修道院对于追求寂静主义的争论。于米格尔·德·莫利诺斯的论战后，最终以道明会的胜利结束。

④ 被称为 *auxiliis* 论战。需要辩论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调和上帝的无限力量与人的自由。对于耶稣会的莫利纳来说，科学能够调和神圣的力量与人类的自由（捍卫这种自由，反对新教宿命论）；然而，对于明道会修士来说，这种观点限制并贬低了神权，为此，国王费利佩二世和教皇克莱门特八世指责耶稣会士是异教徒并将争端带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理事会。最高教皇敦促当事人遵守教规并要求保持沉默，但面对着西班牙国王的不满以及对道明会的支持，教皇禁止出版由耶稣会的德·莫里奈撰写的著作《上帝力量和自由意愿的和谐》（*Concordia liberi arbitrii cum gratiae donis*）。

早期首批神职人员和土著宗教人士都是道明会的，这其中也包括第一大主教——格雷高里奥罗（Gregorio Lo），来自墨西哥的西班牙传教士。这无疑让道明会拥有了最大的宗教权力地位。

对于中国礼仪的争论和福音传播方式^①是引起教派分歧的两个主要方面：在关于中国礼仪的论争方面，首先要提的就是方济各会会士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de la Madre de Dios）和道明会修士胡安·包蒂斯塔·德·莫拉莱斯（Juan Bautista de Morales）一起，与耶稣会开展激烈论战。在胡安·包蒂斯塔·德·莫拉莱斯的著作（1597-1664）《道明会与方济各会的省教区牧师对中国礼仪的宣言》（1635）（*Declaraciones de los Vicarios Provinciales de Santo Domingo y San Francisco sobre los ritos chinos*）里，中国人的证词证实了他们反抗耶稣会神父的声明。加上由道明会与方济各会编制、数名主要基督教徒见证的《关于中国礼仪的法律资料》（1636）（*Información jurídica acerca de los ritos chinos*），表明了中国人对迷信之事的热衷甚至传到了梵蒂冈。根据教诏书（*la Bula Papal*），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四世（Benedicto XIV）最终接受了道明会修士所捍卫的教义^②。

其次，莫拉莱斯（Morales）也在其他作品里表现出对耶稣会的影射，如《关于神父迪亚哥·德·莫拉莱斯（Diego de Morales，马尼拉约瑟夫学院神学教师）所修订的一项长款条约的重要注解和指责。中国事态以及在最重要朝代年间基督教在胡安·包蒂斯塔·德·莫拉莱斯神父（Juan Bautista de Morales，中国传教士）管理下的发展情况（1647）》（*Anotaciones y reparos muy importantes acerca de un Tratado muy largo que el P. Diego de Morale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lector de Theología de su Colegio de S. Joseph de la ciudad de Manila, compuso del estado de las cosas de China y christiandad del populisimo reino de ella, por Fr. 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del Orden de Predicadores, misionero de China*）和《对已做注解的补充说明》（1648）（*Breve adición a los reparos dichos*）。但是他不是唯一一个关注到耶稣会的道明会修士，道明哥·冈萨雷斯（Domingo González）或闵明我（Domingo González o 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也同样写下了《对一份被认为来自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的关于耶稣会神父对中国人进行皈依基督教的传教活动的教会文书的批

① 引自：Arnaud, *Historia de los debates entre los Misionero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de Santo Domingo, i San Francisco, sobre los Ritos de la China*, 1692.

② 莫拉莱斯（Morales）神父首先从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接到了相互矛盾的教令，但在1661年，此事再次引起了教廷对他的注意。1669年，在莫拉莱斯逝世五年后，教皇克莱门特九世发布一项新的反对耶稣会的教令。

判》(*Reparos de un Papel, que los PP.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han divulgado, creiendo era de los Dominicos, i Franciscos, tocante à la conversión de los Chinos*)。万济国也对参与仪式争议的传教士进行概括总结。1671年在他流亡期间，他写了《圣教明征》(*Manifiesto y Declaración*)，这两部条款深受其上级神父胡安·包蒂斯塔·德莫拉莱斯(Juan Bautista de Morale)的思想影响，后来更成为罗马教皇使节在东印度和中国发布教令的基础。

在某些情况下，道明会内部也存在分歧的。当时，莫拉莱斯(Morales)对于礼仪有着自己坚定的立场，但他却通过一名在中国的修士发现了自己教派阵营里的异教徒——巴西利亚主教格罗文藻(Gregorio López)，后者把一本支持耶稣会的备忘录寄送到罗马教廷。

另外，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和排他性也是需要强调的：

我并不是想做评判，但我发现道明会和方济各会会士们的传教方式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不大相同。前者认为后者的手段充满诡计与谜团，但在达官显贵之中却颇有影响。(p.14)

但毫无疑问，他对耶稣会以外的传教士在进入中国的时候遇到的那些额外困难，是抱着批评态度的(González, 1966: 16)。

不同教会之间的布道方式确实存在差异。其他教会的一些传教士认为，中国人很难接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传教士只要在圣周五当天展示一下耶稣受难像就可以了；人是脆弱的，因此不必在讲经证道的过程中着墨于残酷的地方。而意大利道明会修士高齐神父(Cocchi)不这样想，他甚至试图把这类宗教物品作为传教活动的唯一基础。为此，他请求道明会省教区把《玫瑰经》、圣牌、《羔羊颂》和圣像，尤其是玫瑰圣母画像和耶稣受难画像，寄给他(Ocio, 1895: 357)。

这就是最初道明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宗教的方法。著有《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的道明会冈萨雷斯神父如是写道(González, 1964: 61)：

……明白地宣讲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是使我们的宗教在我们所传教之地得以发展和永续的唯一道路。不可半途而废、不可自作聪明自毁前程、不可减损基督教的完整性；不可有荒谬又不明智的让步——即使那让步从某一方面来讲是出于善意的，也终将塑造一批不纯正的基督教徒。他们不可能获得完整的精神果实，任何一阵逆风，都能把他们吹得全无踪迹，如同从未存于世间。

不同教派之间的关系还可见于当时的一些作品中，比如，十七世纪末出版于马尼拉的由万济国所著《华语官话语法》(*Gramática de la lengua mandarina*)一书。在此书的封面上有将道明会与方济各会的纹章绘在一起的

图案。

道明会修士们常将自己的作品进献给西班牙国王，其中就包括《明心宝鉴》的译本。《明心宝鉴》由高母羨（Juan Cobo）修士首次翻译为西班牙文，由米格尔·德·贝纳比德斯（Miguel de Benavides）修士带回西班牙，并于1595年12月23日在马德里的圣托马斯修道院献给西班牙王子费利佩三世。我们之后还会再次提到这本书。

2. 语言学院及道明会修士在语言方面的训练

道明会一向优先保证修士的研究与传教活动，并召开了大量教士会议，以保证这些活动得以顺利进行^①。1241年的布尔戈斯教士会议规定，对已获得研究资格的修士，修道院长不得为其学习设置任何障碍。1242年的潘普洛纳会议特别对神学教师或教授给予关照，规定各位院长必须为所在的修道院配备必要的神学教师，并为他们的讲经活动提供最大的便利。这些便利包括：满足他们对书籍和写作材料的一切需要，甚至要配备专人收集神学教师们的报告。1244年萨拉曼卡会议又规定，每个修道院都应专门配备一名博士和一名修士来协助修道院长安排修士们的研究活动。

培养了大量伟大学者的传教士语言学院，是我们必须要涉及的重要问题^②。1236年在巴黎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教士会议上，通过了鼓励学习非基督教邻国语言的决议^③。根据圣莱蒙多·德·贝聂福德（San Raimundo de Peñafort）的建议，道明会在突尼斯开设了研究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学院。1259年的瓦朗谢纳（法国）教士大会上，授命西班牙省教区的教区修道院长在巴萨罗那或其他地方的一所修道院中，设立一个所有教区的道明会修士均可进入的阿拉伯语大学院。不久之后，在瓦伦西亚和巴萨罗那分别成立了一所阿拉伯语学院和一所希伯来语学院。1291年的帕伦西亚教士大会授命哈蒂瓦修道院建立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双语学院。

在并入萨拉曼卡大学的学院和修道院里，汇集了圣典学家、法学家、神学家、医学家、语法学家、修辞学家、希腊语学者，以及少量的希伯来语

① 经过漫长的时间，修士会议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2010年通过（2014年修订）的最新的教团章程，请见本书第三章，第76到第97条。

② 关于东方语言学院，拉蒙·埃尔南德斯（Ramón Hernández）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见 *Las primeras actas de los capítulos provinciales de la Provincia de España*, 收于道明会档案，1984, p. 5-15。

③ Bernabé Bartolomé Martínez, 1992: *Historia de la educación en España y América*. Madrid: SM, p. 489.

学者。

玛利亚·帕斯·德·赛纳 (María Paz de Sena) 在她的文章《萨拉曼卡大学圣埃斯特万修道院的藏书 (I 和 II)》(《Los libros del convento de San Esteban en la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I y II》) 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任何时候，语言的知识对教义的学习和传播，以及对神学家或其他学者的写作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她指出萨拉曼卡大学的圣埃斯特万修道院内设有语法学院和逻辑学院，而且“它的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卡斯蒂利亚语和拉丁语的语法学书籍、词典和正字法书籍”(Sena, 第 377 页)。

十三世纪，在瓦伦西亚、哈蒂瓦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了东方语言的学习机构。托钵修会的修士可以在这些机构中学习他们将要前往传教的国家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

玫瑰圣母省教区的修士们到达菲律宾之后，着手建立了亚洲的第一所大学。由费利佩二世签署的文献明确记载了这所大学的成立日期是 1611 年 4 月 28 日。

万济国修士在《圣教明征》^① 中记载，道明会修士的官话水平应该比耶稣会修士要好，甚至比很多中国农民要强：

1631 年以后到达中国的二十一位修士中，只有两位不能熟练地运用中文（此时为 1632 年）。其余十九人通过与佛冈^② 信众的长期相处，不仅掌握了中文官话，而且还学会了那些信众的方言。他们可以同时运用这两种差异巨大的语言来传教和管理教会事务。我在广东有所联络的二十位耶稣会神父并不具备这种能力。我从未听说有任何一位耶稣会神父能用官话以外的中国语言举行七种圣礼，而很多妇女和村民根本听不懂官话。（转引自 González, 1964: 394）

那么，道明会传教士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还在马尼拉的时候，他们就主动与当地的日本商人接触，向他们学习日语。传教士们对日本人大献殷勤，于是后者毫不迟疑地与他们成为朋友，甚至，如莫拉乌（同上：36）所

① 西班牙语版本：Varo, Francisco. 1671: Declaración y manifiesto [sic] de la verdad de algunas cosas que dice el reverendo padre Diego de Fabro en un tratado que hizo en prueba de la practica que los padres de la compañía tienen en este reyno de China acerca de la veneración de Confucio, y difunctos, Canton, 13 de septiembre 1671 (Manuscrito de Manila, APD, T73, ff. 142-174)——原注

《圣教明征》中文版本有：清·康熙 16 年丁巳（1677）福州玫瑰堂刊本、清·光绪 29 年（1903）八卷本等版本——译者注

② 佛冈 (Fogán)，广东省清远市下辖县，位于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大三角边缘——译者注

说，正是日本商人安排传教士前往日本的。

和哈辛托·奥尔法内（Jacinto Orfanell，1578年生于卡斯特利翁省的拉哈纳，1622年卒于长崎）一样，许多被派往日本的传教士们在到达教区之后，首先学习了日文，之后才进入长崎的京泊和浜町地区传播福音。

2.1. 语言与传教使命

学习当地的语言对传教士来说是必要的。掌握了当地语言，才能从事编写词汇表和翻译宗教文本的工作。菲律宾所有的道明会修士都来自新西班牙^①，他们把在新西班牙传教过程中形成的重视语言学习的传统带到了这片土地。

关于传教士对本地语言的学习，有些案例令人惊讶。比如，萨拉萨尔（Vicente Salazar）神父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1619-1686）修士的引述^②：

我在中国的十年中，有五年时间要么被囚禁在狱中，要么被流放。我把另外的五年用来学习汉语和践行主给予我的使命。然而，我用这些时间几乎遍读了中国现有的所有书籍，如此，才撰写出那十卷《中华帝国志》^③。（González, 1964: 613-614, 转引自 Salazar, 1742: 483-484）

贝阿托·胡安·德·圣道明哥（Beato Juan de Santo Domingo）也赞叹道，“（闵明我）能够学会所有的语言”（Morán, 1867: 118）。当然，万济国也是语言方面的奇才，他是屈指可数的能够掌握中国司法系统和地区法庭中使用的复杂语言的人之一。因此，他被指派为其他传教士的中文教师。

3. 传教的过程

道明会修士最先要求当地基督徒遵守教会礼仪，比如要求他们在礼拜日和宗教节日参加弥撒，行斋戒，忏悔，受领圣餐。也是最先安排由妇女为临终者施涂油礼，或在洗礼仪式中为受洗者涂圣油

① 新西班牙（西班牙语：Nueva España）是西班牙管理北美洲和菲律宾的一个殖民地总督辖地，于1821年解体——译者注

② Salazar, Vicente, 1742: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parte tercera de la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China, y Tunquin Orden de Predicadores. (第一、二部分作者 Diego Aduarte -Baltasar de Santa Cruz (萨拉戈萨, 1693); 第三部分作者 Vicente de Salazar (马尼拉, 1742); 第四部分 1700年-1765年, 作者是马尼拉圣托马斯主教大学和皇家学院的学监, 方济各会士 Domingo Collantes.)

③ 译者补充

的教团。凡是想要接受洗礼的人，必须宣称放弃曾经抱有的一切迷信，必须熟知基督教教义。道明会向信众不加修饰地直白地讲述耶稣被钉于十字架、神圣人格化、耶稣的受难、死亡与复活等事迹，并公开展示钉于十字架上的耶稣像。道明会最先成功地让当地妇女习惯到教堂听弥撒和做忏悔。最先以书面文字驳斥其他教派的传教士和基督徒充满迷信和谬误的言论。

1644年，在道明会的教区内，道明会修士成立了第一个本地宗教团体，同时出现了中国前所未见的现象：许多青年女子将童贞奉献给耶稣。（González, 1964: 667）

道明会修士谙熟圣经和圣托马斯·阿奎那（Santo Tomás de Aquino）论述圣经的传播和争论的作品。此外，也参考路易斯·德·格拉纳达（Luis de Granada）修士、圣特雷莎（Santa Teresa）、胡安·加西亚·卡明特罗（Juan García Carpintero）等人的书籍，在三个月内实现了用当地语言布道。

3.1. 教区的支持和亚洲教士阶层的产生

有当地人充当道明会修士的助手和翻译，帮助他们进行教义的问答学习。例如，道明哥·伊瓦涅斯·德·艾尔基西亚（Domingo Ibáñez de Erquicia），就有弗朗西斯·修也门（Francis Shoyemon）作为他的传教助手。修也门原是世俗日本人，在教堂做问答学习助手和翻译，后来获得道明会合作教友的身份。在伊瓦涅斯被捕入狱期间，修也门不离左右，两人最终在同一天被判处死刑。

要维系教区的运作，就必须招募人员来组成本地的教士阶层。罗文藻（Gregorio López）是第一个中国籍的道明会主教，亚洲教士阶层的早期塑造者之一，但由于一些悲惨经历，后期他对教士阶层的贡献渐微。

1659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批准远东教区享有人才方面的特权。想要在远东地区成为神父，只需要学习简单的拉丁文，以便能够阅读弥撒常典和圣礼规程即可，不必理解字句的意思：“虽不能理解拉丁字义……只需知道如何朗读。”（转引自 González, 1964: 544-545）

利用这一特权，罗文藻主教将四五位本地长者晋铎为神父（同上：545）。1688年，他准许三位中国籍耶稣会士晋铎，这三位神父只会朗读弥撒常典和圣礼规程，罗主教准许他们用中文主持祈祷。

3.2. 传教的方法

八十年前开始于美洲的传教工作无疑为道明会在亚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对美洲土著使用威权式传教方法的企图最终失败了，这个经验在后来

的传教过程中得到了反省。传教士们更加热情地研究当地的原有宗教，了解这些宗教的神学基础，希望能找到更有效地传播基督教的方法。

省教区第一次教士大会的决议要求修士在对待当地人时，必须要“怀有伟大之仁爱 and 温柔之精神，像对待疼爱的子女，不仅要用言语，也要用文字向他们展示我们的爱，用爱感召他们……”麦迪纳·艾斯古德罗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政治策略，并把其后的三年平和期解读为这一政治策略的效果（Medina, 1990: 579）。1590年初，马尼拉方面收到道明会的胡安·勃兰特修士（Juan Volante）和方济各会的赫罗尼莫·德·布尔戈斯（Jerónimo de Burgos）修士寄自马德里的信件，提醒他们，耶稣会的阿方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神父认为传教活动应该有士兵作为保证。道明会对这种观点作了详细的批驳。

在传教士的培养方面，一种针对当地人的语言、习俗、历史、文化的特殊培训，就显得尤为必要。

尽管教团能否在这片土地长久存续仍是未知数（除教团自身的努力外，这主要取决于教皇和王室的想法），传教士们仍然把建立足够大的能够维持教团存在的信徒群体作为目标。他们要履行道明会修士的天职，使教团在这里扎根，并最终建立一个自治的省教区。

如果传教的主要目的是在各地宣告耶稣之名并传播信仰，传教士们就必须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人所具有的多多样性。为了证明耶稣福音的魅力，传教士本人必须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在生活和传教过程中，成为信仰楷模。为了使传教事业得以成功，传教士需要尽可能地将基督教的生活方式渗入到本地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中。因此，尽快建立一座具有本地风格的修道院，就成为当务之急。

尽管传教事业并不拒绝任何人的皈依，也不对社会群体进行区分，但对儿童和青年的关注是建立一个宗教社会的重点。他们的天真使新鲜的宗教思想更容易渗入他们的心灵。

道明哥·佩雷斯（Domingo Pérez）神父对菲律宾三描礼士省的偶像崇拜方式抱有兴趣，于是他把男孩女孩聚集起来，教他们认字，让他们学习基督教教义，借此了解他们的父母如何教他们进行偶像崇拜。孩子们什么都会讲，但不可以让父母知道，免得挨父母的鞭打。

……之后，道明哥神父把男孩女孩们喊来，叫他们把那些仪式道具撕成碎块，再把它们扔进粪坑，然后叫他们在上面排泄。孩子们顺从地一一照做了。看着被弄得像烂泥一样的道具，孩子们哄笑起来^①。

^① Honorio Muñoz OP, Un héroe Dominicano montañés en Filipinas. Documentos inéditos del siglo XVII, preparados, con introducción y Notas, Centro de Estudios Montañeses, 1951, p. 56.

若要举出以儿童慈善的方式进行传教的案例，当首推迪亚哥·德·圣玛利亚（Diego de Santa María）在马尼拉设立的两所照顾孤儿的学校——圣佩德罗学校和圣保罗学校。两校隶属道明会修道院，受西班牙国王的资助和庇护。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道明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他们的传教士成功地让众多异教的女性信仰了基督教。阿杜阿尔特（Aduarte）神父和李科罗（Victorio Riccio）神父在自己的报告中记录了丰富的女性皈依基督教的案例，也描述了她们改变信仰的行为在最亲近的家人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应。例如，传教士报告中记录了一位叫做培德罗尼拉（Petronila）的异教女性，她的家族依照习俗，为她约定了违背她意愿的婚姻，尽管她已经决定要许下守贞誓言。她的家族坚持履行婚约，希望她会屈服。但她没有。在婚礼当天，她当众宣告婚约无效，拒绝跟她的丈夫在一起生活。作为反叛和不服从的象征，她在所有人面前，“拿起剪刀，剪掉美丽的头发，扔到厅堂的中央。如此，她向所有人宣告了她不可动摇的为主永守贞洁的决心。”（González, 1964, 卷 I: 185）

在这一地区，禁欲主义在传教士到来之前就已经被当地人所信奉。而这样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与道明会的生活方式是相一致的。

4. 宗教本土化

使当地人皈依基督教的计划，意味着在宗教层面上赋予一个人作为人必要的尊严，能够被接纳为基督教团体成员的尊严。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认为，传教士应该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都能通向上帝”的观点。无论是在加勒比、安第斯山区，还是在新西班牙，无论是对西印度卡塔赫纳的黑奴，还是对远东地区的平民，传教士们都采取了因地制宜的传教策略。

使基督教与教区本地居民的文化相适应的工作，或者说基督教本土化的工作，让传教士们愿意适应本地社会的习俗和事物。传教士们时常穿着东方服装，就像图片中那样，这可以被视为一种融入本地文化的福音人格化的例证。

我们也发现将名字本土化的尝试，比如第一部中文官话语法书籍的作者，道明会派驻中国的传教士，弗朗西斯科·瓦罗（Francisco Varo），就使用中文名字“万济国”或“万方济各”。

传教士对待本地语言的方式，也反映了一个跨文化的过程，尽管这种跨文化仍服从于内布里哈（Nebrija）语法模式^①。

^① 齐默曼（Zimmerman）认为语法/拉丁文法是“强制的跨文化语法”（2006:27）

5. 传教士和当地人对彼此的理解

曾有一百一十位道明会修士在日本殉教，何塞·玛利亚·莫兰（José María Morán）在讨论他们的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时说道^①：

日本人性格高傲自负，非常好战。在战斗中，他们的第一次进攻会极为凶猛，但如果被击退，就会灰心丧气。

他们非常重视礼节，甚至过于拘礼。他们非常珍视荣誉和贵族身份。但不是天主教徒的日本人对待战败者和弱者十分残酷，以至于可以说是残忍。（Morau, 1867: 28-29）

在论及语言时，他说：

日本帝国只说一种语言，这对欧洲传教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好处。诚然，就和西班牙山区省份的情况一样，有些地方使用的很多词汇会有变化。日文的书写会用到很多汉字（根据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日文汉字源自中国汉字），但是读音不同，这与许多欧洲词汇的情况一样。

日本天皇对传教士的态度也耐人寻味。当菲律宾总督派遣使者试图解救与圣费利佩号一起被捕的传教士的时候，日本天皇如此答复：

……众教士来我疆土，传蛮邦之邪教异俗。不分男女，乱我仪礼。今汝遣使节来朝，远历风浪，为求修好。若诚有此意，勿复使人来此，传邪经伪教。（同上：p. 32-33）

6. 印刷厂和印刷品

促进知识学习和传播的决定性事件，是菲律宾印刷厂的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道明会修士弗朗西斯科·布兰卡斯·德·圣何塞（Francisco Blancas de San José, 1560-1614）。他指导了一个从未见过印刷机的亚洲人胡安·德·维拉（Juan de Vera）一点点地制造出来印刷机^②。

菲律宾印刷的第一批书籍，即所谓的菲律宾古本，印制于1593年到1640

① José María Morau, *Relación de la vida y gloriosa muerte de ciento diez santos del orden de Santo Domingo martirizados en el Japón*, Madrid, imprenta de D. Policarpo López, 1867.

② Isaac Donoso, “El Barroco Filipino”, en *Historia cultural de la lengua española en Filipinas: ayer y hoy*, en Isaac Donoso Jiménez (Ed.), *Historia cultural de la lengua española en Filipinas: ayer y hoy*, Verbum, 2012, p. 113.

年之间。目前存世的古本极为稀少，根据书志学家雷塔纳（Retana）在《菲律宾印刷品源流》（*Origenes de la imprenta filipina*）中的统计，保存下来的菲律宾古本仅有五十七本。

有必要强调当时菲律宾印刷技术的一个特点，即那时候所有的印刷机都是各宗教团体的财产。

7. 小结：成功与失败

在远东地区传教是教会一直以来的梦想，而教会最终也实现了这个梦想。当时的传教活动面临巨大阻碍，这些阻碍基本上是由传教目标地区内已经存在的强有力的宗教、哲学及政治体系所造成的。调解工作是通过隐晦的或语义清晰的文本来进行的，也证明了调整“翻译”这一概念的需要以及应调整的程度。在该时期所取得的成果显示，这些作品在推动了解东方语言及文化方面有不可否认的价值。十六至十七世纪期间及之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并不能抹杀他们为东方语言及文化知识所作出的贡献。何塞·玛利亚·冈萨雷斯（José María González）（1964：28）的研究表明，在十七世纪，受洗人数达到41000人。到达中国及远东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道明会修士、他们所建造的超过五十座教堂以及上述的受洗人数，都显示了传教士们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传教和传播知识的坚韧精神。

Bibliografía

Aduarte, Diego, 1640: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c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Philippinas, Iapon y China...* Manila: en el Colegio de Sa[n]cto Thomas, por Luis Beltran impresor.

Álvarez del Manzano, Bartolomé, 1895: *Compendio de la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desde su fundación hasta nuestros días por un religioso de la misma Provincia. Comprende desde 1587 á 1895.* Manil: Establecimiento tipográfico del Real Colegio de St. Tomás.

Arnaud, 1692: *Historia de los debates entre los Misionero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de Santo Domingo, i San Francisco, sobre los Ritos de la China.*

Bartolomé Martínez, Bernabé, 1992: *Historia de la educación en España y América.* Madrid: SM.

Busquets Alemany, Anna, 2013: “Primeros pasos de los dominicos en China: llegada e implantación”, en *Cauriensia*, Vol. VIII (2013) 191-214.

Donoso, Isaac, 2012: “El Barroco Filipino”, en *Historia cultural de la lengua española en Filipinas: ayer y hoy*, en Isaac Donoso Jiménez (Ed.), *Historia cultural de la lengua española en Filipinas: ayer y hoy, Verbum*.

Fernández Rodríguez, Rebeca, 2012: *Lexicografía de la lengua ilocana. Estudio de una obra manuscrita del siglo XVIII: el Calepino ilocano*. Tesis inédita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http://uvadoc.uva.es/handle/10324/1788> [consulta: 01.08.2016]

Ferrando, Juan, 1871: *Historia de los PP. Dominicos en las Islas Filipinas y en sus misiones del Japón, China, Tung-Kin y Formosa*. Madrid: Imprenta y Estereotipia de M. Rivadeneyra.

-, Eladio Neira y Gregorio Arnáiz, 2000: *Misioneros Dominicanos en el Extremo Oriente: 1836-1940*. Manila.

González OP, José María, 1964: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1632-1700*. Madrid: Imprenta Juan Bravo.

-, 1966: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Bibliografías*, T. V. Madrid: Imprenta Juan Bravo.

Henrion, Barón de. 1863.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Misiones*, t. I, p. 31, edición de Barcelona. Id., P. André Marie, O.P.: *Missions Dominicaines dans l'Extrême Orient*, t. I.

Los dominicos en el Extremo Oriente.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Relaciones publicadas con motivo del Séptimo Centenario de la Confirmación de la Sagrada Orden de Predicadores, 1916.

Morán, José María: 1867: *Relación de la vida y gloriosa muerte de ciento diez santos del orden de Santo Domingo martirizados en el Japón*. Madrid, imprenta de D. Policarpo López.

Muñoz OP, Honorio, 1951: *Un héroe Dominicano montañés en Filipinas. Documentos inéditos del siglo XVII, preparados, con introducción y Notas*. Centro de Estudios Montañeses.

Ocio, Hilario, 1895: *Compendio de la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zsincia de 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de la Orden cle Predicadores*, Manila, Filipinas.

Payá, Santiago, 1891: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desde su fundación hasta nuestros días por un religioso de la misma Provincia. Parte Segunda. Comprende desde 1658 á 1700*. Manila, Establecimiento tipográfico del Real Colegio de St. Tomás.

Rodriguez de Leon Pinelo, Antonio, 1737: *Epitome de la bibliotheca oriental, y occidental, nautica, y geographica* [ed. Tít. VII, p. 122.

Salazar, Vicente, 1742: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parte tercera de la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China, y Tunquin Orden de Predicadores*. (Partes 1 y 2 de Diego Aduarte -Baltasar de Santa Cruz (Zaragoza, 1693); parte 3 de Vicente de Salazar (Manila, 1742) y parte 4 desde el año de 1700 hasta el de 1765 por... Fr. Domingo Collantes... Cancelario del Colegio Real y Pontificia Universidad de Santo Tomas de Manila.

Sueiro Justel, Joaquín, 2014: “Algo más que construyendo identidades: Fray André López (1690) y la traducción en la lingüística misionero-colonial Filipina”, en *Missionary Linguistics V / Lingüística Misionera V.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issionary Linguistics. Bremen, 28 february-2 March 2012*, Otto Zwartjes, Klaus Zimmermann y Martina Schrader-Kniffki (Ed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ho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Urreta, Luis, O.P., 1611: *Historia de la sagrada Orden de los predicadores en los remotos reynos de la Etiopía. Trata de los prodigiosos Santos, Mártires, y Confesores, Inquisidores apostólicos, de los conventospuritanos, donde viven nueve mil frayles del allehuya con siete mil de los Bedenagli, de cinco mil monjas, con otras grandezas de la religión del padre santo Domingo Valenc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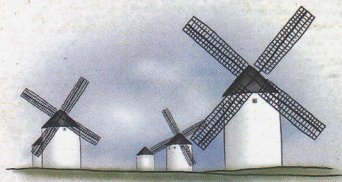
Varo, Francisco. 1671: *Declaración y manifiesto [sic] de la verdad de algunas cosas que dice el reverendo padre Diego de Fabro en un tratado que hizo en prueba de la practica que los padres de la compañía tienen en este reyno de China acerca de la veneración de Confucio, y difunctos, Canton, 13 de septiembre 1671*. (Manuscrito de Manila, APD, T73)

Villarroel, Chus, 2012: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 Rosario. Décimo tema de formación para los novicios Jesús Obrero*, Manuscrito Reg. 11.065 Biblioteca del Convento de Santo Domingo de Caleruega.

Zimmermann, Klaus, 2006: “Las gramáticas y vocabularios misioneros: entre la conquista y la construcción transcultural de la lengua del otro”, en Máñez, Pilar (ed.): *Actas del V Encuentro de Lingüística de la Facultad de Estudios Superiores Acatlán (UNAM), 15 al 17 de noviembre de 2004*, Mexiko-Stadt: UNAM (im Druck).

Zwartjes, Otto, 2014: “El 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de Francisco Díaz (ca. 1643) y la lexicografía hispano-asiática”, e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3452981> [consulta: 01.08.2016]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from an old manuscript or letter,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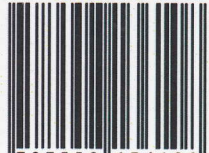


XIBANYAYUDONGYAZAOQIJIASHI
西班牙与东亚早期交流史

责任编辑：邓志科 施薇

封面设计：程娃娃

ISBN 978-7-5581-3610-8



9 787558 136108 >

定价：32.00元